

陈 之 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克鲁泡特金传

陈之骅 著

克 鲁 泡 特 金 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7880

责任编辑 姜 芃  
封面设计 任 意  
责任校对 李小冰  
版式设计 韩 锐

克魯泡特金传  
KELUPAOTEJIN ZHUAN  
陈 之 骅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6插页 275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200册

统一书号: 11190·163 定价: 2.70元

## 引 言

克鲁泡特金是在俄国革命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且具有相当魅力的一个人物。他的颇带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他的独树一帜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他渊博的知识和在学术上的贡献，以及他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和道德品性，在他生前就吸引了许多持不同政见和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他的无政府主义信徒们对他奉若神明自不必说，资产阶级的各类代表人物和学术界人士也普遍对他表示尊重。早在上一世纪的八十至九十年代，一些国家的百科全书或百科辞典上就列有《克鲁泡特金》的专门条目，介绍他的生平与思想。<sup>①</sup>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列宁，不仅对克鲁泡特金的晚年生活关怀备至，而且对他的革命活动和某些著作有很高评价。列宁在1919年5月谈到克鲁泡特金时曾这样说过：“他所写的一些著作是那么精采，他的感情和思想曾经是那么新鲜和充满朝气，……他的整个美好的过去，以及他所写的那些著作，对我们来说毕竟是有价值的，而且是珍贵的”。<sup>②</sup>

克鲁泡特金的一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42—1876年。这是他在祖国的土地上成长和开始革命活动的时期。他由一个高贵的公爵子弟成长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再由改良

① 例如：《法国大百科全书》（La Grande Encyclopédie），1866年巴黎版，第21卷，第649—650页；《德国梅耶尔百科全书》（Meyers Konversations-Lexikon）第4版，1889年莱比锡版，第10卷，第161页；《布罗克豪斯与叶夫龙俄文百科辞典》（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с и Ефрон）1895年版，第32卷，第826—827页；《英国钱伯斯名人辞典》（Chamber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1897年爱丁堡—伦敦版，第560页。

② 《邦契—布鲁耶维奇选集》第3卷（В. Д. Бонч-Бруевич,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т. III），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06页。

主义者进一步转变为一个风云一时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第二个阶段是1876—1917年。这是他流亡西欧的时期，也是他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无政府主义领袖人物的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前期（1876—1886年），他积极投身于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偏重于参加实际斗争；后期（1886年以后）则潜心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发表了大量的著述。第三阶段是1917—1921年。这是他重返祖国、叶落归根的时期。作为一个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基本上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但是，他始终热爱祖国和人民，坚决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苏俄，并且不使自己直接或间接卷入国内外的反苏活动。

克鲁泡特金生平第一阶段所处的是俄国封建农奴制度危机日益加深直至最终瓦解崩溃的时代，也是俄国资本主义开始有所发展的时代。从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来说，这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的鼎盛年代。克鲁泡特金投身革命的时候，革命民粹派已经完全取代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五十一—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运动正方兴未艾。过去有一段时期，国内外学术界对民粹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七十年代革命民粹主义运动的评价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学者们往往片面强调民粹派的局限性和消极作用，很少谈到他们的进步性和革命作用；而且在谈局限性时又常常不作具体的历史分析。这种倾向在我国史学界至今尚未得到完全克服。<sup>①</sup>七十年代的民粹派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还没有开始传播，俄国工人阶级还未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因此，他们不可能懂得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以至灭亡的客观规律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他们主张农民革命，并且坚信俄国可以通过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

<sup>①</sup> 作为一个例子，我们提出李显荣的著作《巴枯宁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书中对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评析是带有我们所说的这种偏颇的（见该书第三章第四节）。

会。他们在一些理论观点上(例如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虽然比五十一六十年代的优秀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有所逊色,但是在建立革命组织,扩大革命运动的规模和影响等方面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他们尽管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但是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以至生命,以自己的英勇斗争给沙皇专制统治有力的打击,同时也进一步唤起了人民。正因为如此,列宁才称呼他们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sup>①</sup>

克鲁泡特金在1872年加入当时最大的民粹派组织柴可夫斯基团以后,很快就成了它举足轻重的一名核心成员。他不仅积极而热情地完成各项革命工作,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他为柴可夫斯基团起草了一份相当完备的纲领,同时,他又为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到民间去”运动的主要倡导人和组织者之一。无论从思想理论水平,或是从实际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来说,克鲁泡特金都堪称为七十年代初期民粹派中的佼佼者。所以,他是站在当时时代的最前列的人物之一。在一大群“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的队伍里理应有他的一席之地。

克鲁泡特金在投身民粹主义运动时已经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一般地说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反映了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破了产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情绪和愿望。当时俄国的资本主义虽然刚刚有所发展,但由于它本来是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因而无政府主义便很容易在这里找到市场。这就使俄国七十年代的民粹主义运动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应当认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尚未出现、工人阶级还没有最终形成的七十年代的俄国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它的矛头所向,首先和主要是沙皇专制统治,包括其整个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国家机器。这和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西欧国家中对马克思主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5卷,第337页。

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团结所起的阻碍和破坏作用不能相提并论。指出这一点，对我们评价克鲁泡特金生平第一阶段的活动是很重要的。

克鲁泡特金在六十一—七十年代曾经长期从事地质地理学方面的考察和研究。这种活动即使在参加革命以后也还在继续。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他有不少发现和贡献，而且达到了相当的学术水平。这在他生前和死后，在国内外都是没有多少争议的。即使在本世纪三十—五十年代的苏联，对克鲁泡特金的研究差不多成了禁区的时期，他在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受到充分的肯定和重视，而且见诸一些公开的书刊和出版物上。<sup>①</sup>有些史学家在研究克鲁泡特金生平时，往往对他的这一部分活动略而不提。推究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认为这部分内容无关大局，与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二是可能觉得这部分内容所涉及的材料专业性比较强，历史学家不大弄得清楚。在我们看来，这方面的内容是克鲁泡特金生平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全面评价他的一生，对于深入研究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和他献身革命的思想的最终确立，都是不可缺少的。此外，特别是克鲁泡特金在1864年曾经两次奉命到我国东北进行探测考察活动，历时共计两月有余。沙俄当局策划和组织这两次考察活动的企图是什么？克鲁泡特金在两次中国之行中取得了什么成果？他在中国看到了一些什么？这些都无疑是我国学者和广大读者所深为关注并感到兴趣的。

克鲁泡特金生平的第二阶段是在西欧，主要是在英国度过的。积极的实际活动和大量的理论著述使他成为巴枯宁以后国际

---

① 例如在1953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23卷上，在《克鲁泡特金》这一条目的释文中，除了对他的思想和活动进行无情的批判外，大部分篇幅是介绍他在地理学研究中的各项成就的，克鲁泡特金被称为“十九世纪最有名望的地理学家”。

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为了阐明克鲁泡特金在无政府主义史上的地位，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比较一下它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特点。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在发展中形成了好几个不同的流派。它们除了在反对国家、否定权威这一点上相同以外，在不少具体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是很不一致的。

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形成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不过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下半叶。一般认为近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是英国的威廉·葛德文(1756—1836)。他在1793年发表的长篇著作《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被有些学者称作是“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圣经”。<sup>①</sup>他认为国家(包括一切立法、司和行政机关)是违反人的理性的，是由一些人的恶习造成的一种祸害，因而必须坚决地消灭之。未来的社会将是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许多小型的自由公社的集合体。葛德文认为，现行的财富分配形式，是按所有权进行的，因而不平等的，不符合人类的理性。在未来社会里，应当实行按需分配。在他看来，按劳分配也是不公正的，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而需要则是相同的。

葛德文的无政府主义是不彻底的。他认为在消灭国家以前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可以保持某些国家机器的“残余”，如解决公民之间的纠纷和负责分配某些产品的司法机关(法院)，以及抵御外敌入侵的国防机关等。这是因为在未来社会的最初时期人类理性的发展程度还未达到执行新制度的要求的缘故。这样的过渡时期在葛德文看来大概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葛德文虽然主张对产品实行按需分配，但他还不能算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他反对组织集体生产和集体消费。他主张进行

<sup>①</sup> 斯·奥索夫斯基：《彼得·克鲁泡特金》(S. Ososky, Peter Kropotkin) 1979年波士顿英文版，第67页。



分散的个人小生产，而且彼此独立，互不依赖。在谈到建立未来社会的方法时，葛德文虽然表示不反对使用革命暴力，但是又说：“不要急于在今天实现那种在明天由于真理的传播而必然实现的事情”。<sup>①</sup>总的来说，革命和他关于人类理性的概念是难以相容的。

无政府主义思想真正的创始人是法国人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克鲁泡特金1883年1月在里昂法庭受审时发表的辩护词中说过：“人们还责备我，说我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始祖。这对我是大大过誉了。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始祖是不朽的蒲鲁东”。<sup>②</sup>蒲鲁东在1840年所写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今天被译成“无政府”或“无政府状态”的“安那其”（Anarchy）这个词。

蒲鲁东在对财产和国家的批判中进一步发挥了葛德文的思想。他认为，财产是一些人凭借自己的力量强行攫取来的。所以“财产就是赃物”；而国家和政府便是财产造成的一个最大的恶果。国家体现了强者的意志，剥夺了人们的自由，维护了社会的不平等。蒲鲁东提出了一个被称为“互助主义”的救世良方。他认为，社会财富分配之所以不平等，关键在于生产者得不到自己商品的全部价值。因此，他主张生产者根据自愿原则，通过订立契约进行互助合作，彼此“等价交换”各自的产品。他建议成立所谓“人民银行”来组织这种交换，并向有困难的生产者发放无息贷款。这样，资本主义的剥削现象就可以消灭，全体生产者的自由、平等便可以实现。这时，国家和政府已经完全不再需要，人们通过各种契约可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就是蒲鲁东所谓的“无政府状态”。

① 威·葛德文：《论财产》，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90页。

②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7页。

很显然，蒲鲁东的“互助主义”方案和“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理想是建立在小生产者的小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其目的是使小生产者不受资本主义经济的排挤，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从蒲鲁东的方案同时还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改良主义者。他的理想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逐步实现的。

和蒲鲁东差不多同时的另一个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是德国的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恩格斯称他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sup>①</sup>他在1845年发表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施蒂纳和蒲鲁东一样，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不过他的个人主义较之蒲鲁东更强烈、更露骨。他是一个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者。

施蒂纳认为，除了有其需要、欲求和意志的“唯一者”，即“我”以外，现实之中什么都不存在。因此，他主张把“我”这个唯一的真实本质当作一切的出发点。他还认为，国家、法律、权利、宗教、道德等等，都是以抽象的名义强加在“我”身上的镣铐，因此必须用一切手段与之进行斗争。施蒂纳否认任何他人的财产权。他说：“别人的财产只有在你承认它合理合法的时候才是合理合法的。如果你不承认，它对你就根本不合法了”。<sup>②</sup>因此他认为，只有“我”才是财产的所有者。

施蒂纳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财产的集体所有制。他说，一旦共产主义消灭了个人的财产，就必然使社会所有的成员都变成“乞丐”。他和蒲鲁东一样，要求保存小私有制。他主张在消灭国家以后成立一个“利己主义者联盟”来取代国家，以实现人人平等。这种“联盟”实际上也就是小生产者的联盟。他反对蒲鲁东提出的“互助主义”，因为这种“互助主义”与个人主义是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7页。

<sup>②</sup>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36页。

完全对立的。他同时也不赞成蒲鲁东的改良主义，而提倡“阶级斗争”。不过他所谓的“阶级斗争”是一些利己主义者和另一些利己主义者之间的激烈斗争。

在谈到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特点时，普列汉诺夫写道：“他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把自己的个人主义理论发挥到极度的胆量。他是最英勇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他比较起来，克鲁泡特金和现今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是无政府理论始祖的蒲鲁东不过是迂腐的庸夫俗子罢了”。<sup>①</sup>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国际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出现，蒲鲁东、施蒂纳所宣扬的個人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无政府理论已经日益不得人心。于是，又一个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便应运而生。这就是俄国人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巴枯宁认为，国家、法律和私有财产都是人类进化的低级阶段，即所谓“动物性”阶段的一种制度。国家是宗教的产物，它对外进行征服，对内掠夺弱者，压制自由。私有财产是继承权引起的，而继承权则是国家原则的表现和产物。所以，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由”和“平等”，必须废除国家（首先是废除继承权）和私有制。

巴枯宁的理论与他前人相比较，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是主张通过暴动的手段立即消灭国家。在巴枯宁看来，国家是不会自动消亡的，必须采取革命的暴力将其推翻。他崇尚自发性，认为群众是天生的革命者，他们不需要进行组织和训练，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会立即起来暴动。他强调破坏，说什么“没有广泛的热烈的破坏……便不可能有革命，正是从破坏之中或是仅仅借助于破坏，才能诞生新世界”<sup>②</sup>。巴枯宁理论的第二个特点是主张

①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38页。

②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转引自李显荣《巴枯宁评传》，第141页。

实行“集产主义”。他认为，在废除了私有制以后，应当把全部生产资料交给各个工农业生产劳动组合集体占有。这些劳动组合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受任何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他特别强调说，这种“集产主义”与国家所有制和国家领导下的集体所有制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主张分散，后两者主张集中；前者强调自由，后两者强调统一。由此可见，所谓“集产主义”，其实质仍然是个人主义。但是同时也应当承认，“集产主义”与蒲鲁东、施蒂纳的个人主义毕竟是有所不同的，这正是巴枯宁为无政府主义理论提供的新东西。

在上述几个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中，葛德文和施蒂纳是纯粹的理论家。他们和社会主义运动没有直接联系。蒲鲁东虽然从事过一些实际活动，但主要也还是一个理论家。巴枯宁则不然。他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实际活动上。他虽然也写了一些理论著作，但他的理论研究与实际活动相比显得并不突出。巴枯宁把无政府主义理论由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行动纲领。有的人认为，“巴枯宁与其说是理论家，毋宁说是运动家”。<sup>①</sup>这样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克鲁泡特金是巴枯宁以后最大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也是无政府主义史上最后一个具有国际意义和影响的领袖人物。他被称作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集大成者”。其实，他并不是简单地承袭了前人的理论，而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和发展。他不仅提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从而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肇创了一个新的流派；而且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体系。他在1910年谈到自己对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时这样写道：“著者（克鲁泡特金自称——引者）是共产的无政府党人之一。他曾经为下列的几种事务劳瘁了许多年：（1）说明

<sup>①</sup> 波多野鼎：《近世社会思想史》，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192页。

自然科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2)研究社会之中对于无政府主义已有的倾向，罗列而说明之，为无政府主义立一个科学的根据；

(3)替无政府主义者的道德立一个规模。若论无政府主义本身，著者认为共产主义较集产主义易于实行；而无政府共产主义（即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则又比别种共产主义容易实行。……著者于发明此等思想之外，又尝用生物界无数的事实，证明互助为社会进化的一大因素，以和达尔文的竞争学说对抗”。<sup>①</sup>这段话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克鲁泡特金理论活动的实际情况，不过他所制定的理论却绝不能被认作是“科学”的。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基础是他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他认为，人和动物一样具有互助的本性。它使人类得以生存下来，并使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这种本性也必然导致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和压迫人的权威（国家）发生冲突。历史上的各次革命便是这种冲突激化到一定程度而发生的现象。人的互助本性在其发展中有时也会遭到暂时和局部的挫折，但是经过反复的较量，最终必将战胜权威，使人类进入美好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在克鲁泡特金看来，互助本性还决定着人类的道德准则；个人首先要关心他人，并为集体而献身；只有整个社会繁荣，才有个人的幸福。不难看出：这个以“互助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是彻头彻尾历史唯心主义的。

克鲁泡特金时常谈到他在方法论上的所谓“科学性”。他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建立在以现代的机械方法解释各种现象的基础之上的宇宙观……无政府主义的研究方法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任何一个科学结论都应以这种方法加以检验”。<sup>②</sup>在他看

① 克鲁泡特金：《社会思想的演进》，重庆平明书店，1938年版，第14—15页；另见克鲁泡特金为大英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11版所写的《无政府主义》条目的释文，载该书第1卷（纽约，1910年），第918页。

② 克鲁泡特金：《近世科学和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版，第60页。

来，这种把“无数的事实”“罗列而说明之”的方法要比用所谓“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来说明问题可靠得多。其实，克鲁泡特金在研究中使用的这种方法，不过是从孔德和斯宾塞那里引进的实证主义方法而已。

无论如何，克鲁泡特金为无政府主义理论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他把近代无政府主义，或者象有些人说的“古典无政府主义”思想推到了顶峰。

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至今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从本世纪的六十年代末期开始，在西方国家中对克鲁泡特金的兴趣大为增长。1968年巴黎极左的学生运动领导人运用克鲁泡特金的观点来“批判”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对于使自己获得权力比对于解决社会冲突更感到兴趣”<sup>①</sup>。很多克鲁泡特金著作的新版本在这个时期相继问世。<sup>②</sup>一些作家和当代无政府主义者纷纷指出克鲁泡特金某些理论观点的“现实意义”，并且断言这位无政府主义理论大师当时提出的很多设想今天正在变成现实。例如英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林·沃德在1974年写道：克鲁泡特金的《田园、工厂、手工场》这部“对托尔斯泰、甘地和毛泽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是“十九世纪写的一批伟大的预言书之一，它的时代今天正在到来”。<sup>③</sup>沃德认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动力

① 马·米勒：《克鲁泡特金》（Martin A. Miller, Kropotkin），1976年芝加哥—伦敦英文版，第136页。

② 例如：《伦理学》，1968年纽约英文版；《国家的历史作用》（弗农·理查兹的新译本），1969年伦敦英文版；《克鲁泡特金的革命政论》（罗杰·鲍德温编），1970年纽约英文版；《法国大革命》（乔治·伍德科克、伊凡·阿瓦库莫维克作序），1971年纽约—伦敦英文版；《俄法狱中记》（保罗·阿夫里契编），1971年纽约英文版；《一个革命家的回忆录》（尼古拉·沃尔特编），1971年纽约英文版；《互助：进化的要素》（保罗·阿夫里契编），1972年伦敦英文版；《面包与自由》（保罗·阿夫里契编），1972年伦敦英文版。

③ 科·沃德为他所编的克鲁泡特金：《明天的田园、工厂、手工场》（C. Ward [ed.], P. Kropotkin,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Tomorrow, 普利茅斯，1974年）一书写的序言。书名中“明天的”一词系沃德所加。

来源的变化使得地理上的工业集中成为过时的现象，正如在自动化条件下大批工人集中在一起进行生产已不合潮流一样。因此，克鲁泡特金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提出的工业分散的主张在今天不仅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有利的。<sup>①</sup>沃德还指出，根据当前许多消费工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装配这样一个事实，克鲁泡特金关于重新回到家庭工业去的思想也即将实现。<sup>②</sup>

美国学者保罗·古德曼主张在中心城市周围发展小规模集约化农业，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出现带有卫星城市的大都市，也可以保证中心城市的各种食品供应。<sup>③</sup>他还认为，进行集约化生产的自给自足的小型农业共同体是和农村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分散的前景紧密联系着的。<sup>④</sup>这种观点显然也是受到了克鲁泡特金思想的影响。古德曼对克鲁泡特金的教育理论也深为欣赏。他批评了美国的教育制度，认为应当按照克鲁泡特金关于实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一体化的思想去进行改革，以适应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sup>⑤</sup>另一名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称克鲁泡特金是十九世纪最有思想的人物之一。<sup>⑥</sup>芒福德认为，现代工农业技术的发展，为一种更为分散的小规模的城市形式奠定了基础。这种小单位不仅能加强人们的相互接触，使他们同时享受城市和农村两方面的好处，而且还能消除城乡之间、农业工人和城市工人之间的不平等。他说：“克鲁泡特金在汽车、无线电收音机、电影、电视系统和世界范围内的电话发明之前就预见到了这些意

---

① 参见科·沃德：《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C. Ward, *Anarchy in Action*)，1974年纽约英文版，第99—101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107页。

③ 参见斯·奥索夫斯基：《彼得·克鲁泡特金》第158页。

④ 同上。

⑤ 参见马·米勒：《克鲁泡特金》，第186页。

⑥ 参见刘·芒福德：《历史上的城市》(L.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1961年纽约英文版，第514页。

义……以小单位为基础，他看到了建立一种更能负起责任、更易于作出反应的地方生活的可能性，那些为庞大的组织所忽视而未能得到发挥的人力，也将获得更大的活动余地”。<sup>①</sup>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和与之紧密相联的伦理学说在今天的影晌更为广泛。不仅在西方，而且在苏联的学术界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例如西方学者亚历克斯·康福特认为，人类从事创造性劳动和营社会生活的推动力是“自然”输入于社会组织之中的。这种推动力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最清楚可见的一条贯串线”。<sup>②</sup>他还认为，人类结合和秩序之所以能够保持，是由于个人心理上的原因，而不是任何统治体系和权力所致。人与人之间相互恐惧的关系必将为个人的责任感和相互帮助的关系所代替。<sup>③</sup>在这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说在苏联学术界颇受推崇。一些苏联学者指出，这位“卓越的达尔文主义者”在将近一百年前提出的这种学说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例如B.П.埃佛罗依姆松教授认为，伦理学的形成过程中既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生物因素的影响。人类的道德感情是经过物竞天择的规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他说：“一个种族在它任何一个成员的极端利己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和凶残如兽的条件下即使能够生存，也是不能留下后代的，它的进化也将终止。人类之所以能保存至今天，是非常细致地选择了那些被称为自我牺牲、善良心地、人性、人道主义以及亲密情谊等特性的结果”。<sup>④</sup>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善良心地这类特性是经过选择形成的，那么它们是不能遏止的，它的根基较之那些掠夺本性和由漠不关心和贪生怕死产生

① 刘·芒福德：《历史上的城市》，第514—515页。

② 参见斯·奥索夫斯基：《彼得·克鲁泡特金》，第162页。

③ 同上。

④ 苏联《哲学问题》杂志（《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70年第8期，第126页。



的自我保存的本性更为巩固。它迟早会占上风，使人道主义在社会中获胜。这种人道主义是永远不会被扑灭的，即使是在暴君和虚伪统治的黑暗的年代”。① 苏联科学院院士Б.Л.阿斯塔乌罗夫也赞同埃弗罗依姆松的上述观点，并且对克鲁泡特金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说作了很高的评价。②

对克鲁泡特金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无论是在苏联，或是在其他国家都是开展得很不够的。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和传记聊无凡几。这和克鲁泡特金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非常不相适应的。

在苏联，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即在克鲁泡特金去世以后，就陆续出现有关他的著述。③ 它们多数是对他的革命经历作正面的介绍，其中有不少是他的同志和追随者写的，倾向性比较明显。这些著作的篇幅都不大，所引用的原始资料也很有限。总的来说，它们都还称不上是研究性的著作。从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克鲁泡特金研究在苏联学术界差不多成了禁区。除了少数介绍和论述克鲁泡特金在地理考察和研究方面的贡献的著作外，④

① В. 埃弗罗依姆松：《利他主义情感在进化论和遗传学上的起源》（В. Эфроимсон, Эволюционно-генетическ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альтруистических эмоций）载苏联《教育科学院学报（学术思想）》（《Научная мысль. Вестник АПН》）1969年，第11辑，第38页。

② 参见Б. 阿斯塔乌罗夫：《大写的“人”字和人性的遗传学上的进化》（Б. Астауров, Человек с большой буквы эволюция генетик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载苏联《新世界》杂志（《Новый мир》）1971年，第10期，第220页。

③ 例如，Б. 戈列夫：《1917—1921年间去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Б. Горев, Памятник борцам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огибшим в 1917—1921 гг.）莫斯科俄共（布）十月革命史委员会出版社，1922年；Н. К. 列别捷夫：《彼·阿·克鲁泡特金传略》（Н. К. Лебедев, П. А. Кропоткин,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莫斯科，1925年；С. А. 波格丹诺维奇：《造反者公爵》（С. А. Богданович, Князь-Бунтовщик），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

④ 例如，С. 阿尼西莫夫：《彼·阿·克鲁泡特金的几次旅行》（С. Анисимов,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П. А. Кропоткина），莫斯科—列宁格勒，1943年；В. 奥布鲁切夫：《彼·克鲁泡特金》（В. А. Обручев, П. Кропоткин），载《俄罗斯科学家》（Люди Русской Науки）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第588—598页；Г. 卡尔波夫：《彼·阿·克鲁泡特金——西伯利亚大地的考察家》（Г. В. Карпов,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ой П. А. Кропоткин），莫斯科，1961年。